我们所走过的道路
（代序）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基础教育是从 1904 年开始的，经过 100 年的风雨历程，已成长为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础教育。但是，就在我国基础教育度过 100 年华诞的时候，世界历史和世界教育的发展又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因此它又必须经历一次新的嬗变，新的涅槃。当此之际，回顾一下这 100 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并在此基础上认真分析当前面临的现实，对于我国基础教育今后的发展也许是必要的。

一

1901 年，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1904 年，颁布了标志我国新教育诞生的“癸卯学制”。1905 年，废除了实行 1000 多年的科举制度。一边布新，一边除旧，新教育就这样诞生了。

“癸卯学制”诞生于 1904 年，在其孕育过程中有三个来源：一是教会学校，二是洋务学堂，三是维新时期的教育运动。

西方传教士在我国创办教会学校始于 1839 年，这就是创办于澳门的“马礼逊学校”。到 1862 年，教会学校发展到 50 所，学生 1000 余人；到 1877 年，教会学校发展到 347 所，学生 5417 人，其中有女子学校 38 所，学生 777 人。这些教会学校的办学模式源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教育根本不同，它有正规的教学体制和各阶段相互衔接的修习年限。在教育对象上，不分贫富，不分男女，均可上学；在教育内容上，除人文学科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还有大量的自然科学课程；在培养目标上，不仅培养仕人，也培养各类专门的人才；在教学方法上，实行分年级分学科教学，不少学校还有实验室，少数学校还提倡学生自己做实验。总之，这些教会学校，更近似于中国后来出现的新式学校，它实际上为后来中国新式学校的诞生起着示范的作用。

洋务派办学始于 1862 年，第一所学校是京师同文馆，同文馆先是学西文，接着学西艺，开设的课程有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及国际法学、政治、经济等，并实行分班分级教学，采用实验法，注重实习，学校设有图书馆、博物馆、实验室等新式机构。在同文馆的带动下，洋务派官僚先后在各地兴办了 30 多所新学堂，这些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教育的新学堂是中国人自己开办的第一批新学校。

1898 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洋务派失势，维新派上台，在“百日维新”中，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教育的法令，主要内容是提倡西学，规定所有学堂必须兼习中学、西学，并将各地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和西学的学校。后来维新运动虽然很快失败，但变法维新的思想已深入人心，1900 年，清政府在遭受“庚子之变”的重大打击后，不得不开始实行“新政”。“新政”中最重要的是“兴学”，“癸卯学制”就是在“兴学”中诞生的。

“癸卯学制”包括学务纲要、各学堂管理通则、考试章程、奖励章程等共 22 个文件，对从蒙养院到通儒院等各级各类学堂，从教员任用到学校管理，从立学宗旨、培养目标到入学规则、学习年限，以及办学条件均做了详尽的规定，特别是在课程设置方面打破了中国传统教育中由儒家经典一统天下的局面，体现了中学、西学兼习的要求。例如中学堂的学习科目为：修身、读经讲经、

中国文字、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等。学制规定每周上课 36 小时，课程安排上，也兼顾到学科知识体系和学生年龄发展阶段的特点。

“癸卯学制”的基本精神是“中体西用”，也就是学制文件中说的：“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1906 年清政府新成立的学部又更加明确地指出这一原则为二类五条：第一类为“忠君”、“尊孔”两条，第二类为“尚公”、“尚武”、“尚实”三条。学部的解释说，前两条为中国政教之所固有，后三条是中国民质所最缺，前者要坚守，后者要补充。“中体西用”是洋务派的文化纲领，作为一种理论，它萌生于 19 世纪 40 年代魏源提出的“师夷制夷”说，明确提出这一理论主张的是张之洞。“中体西用”学说一经提出，影响和制约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教育发展 100 余年，在以后的各个时期，虽然其表述各异，但其精神一直存在。这一理论如果说在提出的当时，还有某种强调其“用”的积极性的话，但越往后来，其负面影响越大。它犹如一块巨大的阴影时常遮挡住世界文明洒射到中国的阳光；犹如一条巨大的绊马索，使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严重受阻并屡屡跌跤。

尽管“癸卯学制”有着“中体西用”这一先天的致命痼疾，但它毕竟是一个新的学制，它使中国教育从此离开了旧的轨道而步入现代化的道路。新学制实施后，我国的教育事业获得了明显的发展，据有关资料统计，1902 年全国学生数为 6912 人，1905 年发展为 258876 人，1909 年猛增到了 1622458 人。更值得重视的是，义务教育的理念也开始提出来，1904 年的《学务纲要》指出：“蒙养院，初等小学堂，意在使全国之民，无论贫富贵贱，皆

能淑性知礼，化为善良”，“初等小学堂为养正始基，各国均任为国家义务教育。东西各国政令，凡小儿及就学之年而不入学者，罚其父母，为强迫教育”。根据清政府学部的计划，预定在宣统七年（1915）颁布强迫教育章程，宣统八年（1916）开始实行强迫教育。但是，清政府没熬到这个时候就垮台了。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到 1900 年八国联军进京的 60 年中，清政府顽固守旧，害怕并镇压改革，积贫积弱，因此一次又一次被打得晕头转向，终于元气耗尽。1901 年不得不实行“新政”，但仍然固守着“中体西用”的原则，最后终于被赶出了历史舞台。正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二

1912 年 2 月，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他认为教育必须养成共和国之健全人格，因此很快废止了清末“忠君”、“尊孔”等教育宗旨，而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主张。“五育并举”主张经修改后成为民国政府的教育宗旨，这就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这一宗旨经过新文化运动的辐射而成为社会共识：教育应该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国民。

在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夕，美国学者杜威来华讲学，这是当时影响中国教育发展的大事件。杜威是世界著名教育家，他在中国进行了百余场讲演，行迹遍 14 个省市，讲学长达两年，其思想和言论在报刊上广为传播。他的讲演稿后结集出版，仅在杜威离华前就重版 10 次，每版印数均为 1 万多册，其广泛影响与轰动效应可见一斑。中国新教育在建立之初，是取法日本，这以“癸卯学制”为代表，但在五四时期杜威学说广泛传播后，强调发展儿童

个性，注重儿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建立学校与社会的广泛联系便成为教育界的主流意识。这以 1922 年制定的“壬戌学制”为代表。这个学制提出了教育的七项目标：（1）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2）发挥平民教育精神；（3）谋个性之发展；（4）注重国民经济力；（5）注意生活教育；（6）使教育易于普及；（7）多留各地伸缩余地。这七项目标一方面反映了杜威教育思想的进步内涵，另外也体现了现代教育的基本精神。

教育思想活跃，教育流派纷呈，办学热潮高涨，是这一时期教育的主要特点。它带来的最直接的结果是教育规模迅速发展，据统计，1912 年全国各类学校是 8.7 万所，学生为 293.3 万人；1922 年，全国学校数进一步增加到 17.9 万所，学生数发展到 662 万人。10 年时间，教育规模扩大了一倍。

在教育事业的总体发展中，又有两方面的发展，特别值得重视：一是女子教育的发展，1916 年全国中学女生仅 724 名，到 1923 年已增加为 3249 名，1925 年又进一步增长到 7956 名，虽在学生总数中所占比例仍然很小，但其增长速度超过了教育规模的总的发展速度。二是出现了一些教育发展先进地区和典型，其中首属山西省。山西省的教育原来并不先进，民国之后，阎锡山执掌山西军政大权，1917 年又任山西省长，他作为孙中山的信徒，对发展教育的重要性有很高的认识，从 1917 年起，他采取激进主义政策，强行推进义务教育，使山西的教育发展一举超过了当时教育最发达的江苏省。1923 年，山西省据说已经使 60% 的学龄男童和 11% 的女童都上了小学，当年山西国民学校学生数达 1089141 人，为江苏省的两倍多，而山西的人口仅为江苏省的一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方面教育规模快速发展，一方面军阀混战，军费开支庞大，因之教育经费不足便成突出矛盾。整个 20 年代，教育界发起一次又一次索薪运动。1921 年，政府积欠北京教育界经费达三个半月之久。6 月 3 日，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随教育部次长赴总统府请愿，与守兵发生冲突，伤及多人。1922 年，北京、武昌、江西、安徽、陕西、四川等地都发生索薪风潮，这一风潮后来发展为教育独立运动。这一独立运动贯穿于整个 20 年代，它有三项基本主张：一是主张教育经费独立，即教育经费法定，由教育界直接取用，共同保管，政府无支取之权，以绝其挪用克扣之道；二是教育行政独立，教育界人办教育，教育不附属于不良政治之下，学术研究应独立于政治和党派之外；三是教育独立于宗教，这是针对中国存在的大量教会学校而提出的，要求对之进行本土化，世俗化，非宗教化改革。关于教育独立运动，蔡元培曾发表《教育独立议》一文，从发展个性的教育目的出发，认为“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教育经费不足，是中国新教育自诞生以来就存在的困境，因此，关于增加教育投入，教育经费独立之类的呼号，就一直响彻整个 20 世纪。

三

从 1927 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到 1949 年国民党政府败走台湾，中国教育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这一阶段又分为三个时期：从 1928 年到 1937 年是稳定发展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是艰难发展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是停滞和倒退时期。

蒋介石定都南京后，便开始了建立国家权威，加强思想控制的努力，在教育方面，提出了“党化教育”的口号，拟定了“党

化教育”的大纲，发布了学校实施“党化教育”工作方案。“党义”进入学校课程，“党化教育”无非是为其一党专制服务，理所应当地受到了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坚决抵制，如著名科学家任鸿隽就撰文说：“党化与教育，是不能并立的：有了党化，便没了教育；反过来，要有教育，先取消党化。”“国民政府，是应该对全国教育负责的。所以它的义务，应该先发展教育，再说党化。”后来，党化教育搞不下去，其理论基础本身也难以自圆其说，所以又改为“三民主义教育”，要求以“三民主义精神”作为学生人生观，实际上仍然是搞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在这一口号下，封闭了不少进步学校。教育过分政治化，甚至把教育作为帮派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工具来使用，全不顾民族利益和受教育者本身的发展，这也是中国 20 世纪教育史上一大部分时段的一大顽疾。

不过，国民政府在加强对教育控制的同时，也加强了对教育的投入和保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1932 年以后，随着南京政权的逐渐巩固，国家财政逐步统一，中央政府对教育的投入逐年增加。1930 年度教育经费仅占国家预算的 1.46% ，到 1935 年教育经费增长了两倍多，达到国家总预算的 4.8% 。随着教育保障的改善，教育规模也稳步扩大，1929年全国初等教育学校数为 21.2 万所，学生数为 888.2 万人，到 1936 年，学校数增至 32 万所，学生数则为 1836.5 万人。中学数 1928 年是 954 所，1930 年为 1950 所，中学生则由 1928 年的 18.4 万人增加到 1936 年的 48.3 万人。

自民国成立以来，虽然新教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对新教育的批评仍然很多，其中最集中最强烈的批评是新教育从外国来的，与中国社会尤其是与中国农村的情况结合不够。随着批评的

深入，一些忧国忧民并抱有“教育救国”抱负的知识分子，开始把教育的眼光投向农村，纷纷到农村开展教育实验，并把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相结合，形成了一场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据有关资料统计，当时全国各地先后建立的农村教育实验区多达193处，其中最有影响的实验有：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进行的农村教育改革实验，梁漱溟领导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县进行的改革实验，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苏昆山县进行的农村改进实验，陶行知在南京晓庄进行的乡村师范学校实验和在上海组织的山海工学团实验等等。这些实验虽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但与实验者所设想的“教育救国”、“教育救民”、“教育改造农村社会”的目标，却都相去甚远。这也给后人一个启示：在政治体制不良的情况下，教育的力量是有限的。

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当年召开的建国后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新中国的教育改革方针：“以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这里指出了新中国教育建设的三个来源，但是这个方针并未实行，后来的实际情况是：解放区的教育经验没有采用，旧教育被全面否定，只是向前苏联学习形成了“一边倒”。

1950年和1957年，凯洛夫的《教育学》两次在我国翻译出版，印数达50万册。凯氏的著作，当时被我国教育界奉为经典。凯洛夫本人也取代了杜威，成为当时中国最有名的外国教育家。凯洛夫与19世纪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都属于“主知主义”，在教

育上重视知识传授的完整性、系统性，强调教材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强调整齐划一的教学标准和教学计划。只是凯洛夫比赫尔巴特更加刻板化，更加强调“教师中心”、“教材中心”和“课堂中心”，他甚至认为教师的每一句话和每一次指示，对学生来说都有“法律的性质”，儿童不过是“教育影响的客体”。不难看出，这套价值体系和教学方法所强调的东西和中国传统教育的精神是一致的。因此它成了我国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某种程度上封建传统教育借尸还魂的实际上的载体。

“十七年”教育中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对教育的政治功能不断强调和提升，195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综合当时的做法，对教育的政治功能的强调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强调党委对教育的绝对领导。规定“一切教育行政机关和一切学校，都应该受党委的领导”，1958 年的《指示》还批驳了“以为只有专家才能办教育”、“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委不懂教育”等一些论点，强调党领导教育的绝对性；二是在学校设立专门的政治工作机构，中学普遍在教务处之外设立了政教处；三是将政治教育课程化，50 年代初废止了国民党时期设置的“党义”、“三民主义”等课程，政治课程没有再开设，但到了 50 年代后半期，大中小学又都普遍开设了政治课，教材主要是毛泽东著作；四是建立教职工的政治学习制度，到了每周固定的学习时间，大家一齐放下工作去参加政治学习。

对教育的政治功能的过分强调，危害深远。第一，过多的政治课占用了学生的学习时间，使学生的学习效率降低；第二，外

行领导内行，使学校教学常常不按规律办事；第三，政治机构的设置使学校非教学人员增多，承担教学任务的教师负担加重；第四，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制度有时耽误了正常工作；第五，“十七年”中对政治功能的过分强调与提升，为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在舆论上和在人们心理上做了准备。“文化大革命”只是在此基础上再往前走了几步而已。

“十七年”教育在教育规模扩张、教育事业发展方面，应该说是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学龄儿童的入学率由 1949 年的 20% 增加为 1963 年的 84.7%，小学在校生人数达 1.6 亿，比 1949 年增加了 4.8 倍；中学在校生总数达到 1431.8 万人，比 1949 年增加 11.3 倍。青壮年文盲半文盲则由 1949 年的约 80% 降至 1964 年的 38.1%。不过在教育的数量、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现象也越来越突出，具体呈现为三重三轻：即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重城市教育，轻农村教育；重专业教育，轻普通教育。总之，是重精英教育，轻大众教育。这样就进一步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使多数人的教育权利受到损害，而落后的国民素质又制约着中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五

1966 年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十七年”延伸和发展，它不是从天而降，“十七年”是它的土壤和温床，“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红卫兵就是由“十七年”的 教育培养出来的。不过，从“十七年”到“文化大革命”，应该说是从“量变”过渡到“质变”。

在教育上“十七年”中对政治的过分强调发展到文革时

期的以政治代教育，再到不要教育，从“十七年”中强调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知识越多越反动”，教师都是“臭老九”。一方面全盘否定教师，一方面不要教育，只要政治，而政治最后又变成帮派斗争的工具，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关于教育的基本状况。

当然，这期间中小学的数量还在增加，中小学的学生数也在增加，但学制缩短了，教材简化了，学生读的书主要是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著作，教材中保留的少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也只是为了说明毛泽东思想正确和伟大，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等等，凡是毛主席的语录一律用黑体字重点标出。学校开展的活动主要是阶级斗争以及对毛泽东思想的歌唱和宣传，管理学校的人则是军宣队、工宣队、贫下中农宣传队。文革后期，上大学只要手上有老茧就可以了。

“文革”结束后，主要是恢复到“十七年”的教育，先是恢复高考。从“不要教育”恢复到“要教育”，从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恢复到“老九不能走”，尽管只是简单地回到了“十七年”，但当时无论是被恢复名誉的被解放的教师，还是造反造厌了的青年学生，都认为这是“第二个春天”。一方面是由于“春天”更加激发了人们的青春活力，一方面则由于实际上的人才缺乏。所以当时“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出第一流人才”的呼声很高。怎样出？办法是现成的：老师严要求，学生刻苦学，在所有学校中设重点学校，在重点学校中设重点班，在重点班可鼓励天子生，在大学设少年班，在儿童中宣传“神童”等等国家对人才的重视，社会对教育的呼吁，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要求，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汇成一股教育热潮。这个热潮一方面使我国的教育事业得到快速发展，各阶段教育的入学率都大幅提高，但另一方面，传统教育和“十七年”教育中一些不好的做法，如“题海战术”、加班加点等也都很快恢复了，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1981 年，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文章，呼吁各方面关注中学生在高考重压下负担过重问题。1985 年秋季，北京 1 名 12 岁的初一女生在家庭重压下喝敌敌畏自杀，当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亲自为此事作过批示。但遗憾的是，诸如此类的事后来还是经常地发生。

八

1985 年 5 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指导我国从 80 年代中期到 20 世纪末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

首先，它提出了新的教育方针，这就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显然，它是对 1958 年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否定和替代。教育从为政治服务转变到为经济服务，虽然还没有明确教育的主体地位和教育在各项事业中基础性、全局性、先导性作用和战略地位，但毕竟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其次，是在教育的投入上做出了“两个增长”的决定，即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除了这“两个增长”以外，为了教育的稳定发展，地方政府还可以征收教育

费附加，作为教育经费不足的补充。另外，《决定》还严肃指出：“现在各级都有一些领导干部宁肯把钱花在并非必要的方面，对于各种严重浪费也不感到痛心，唯独不肯为发展教育而花一点钱，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第三，对传统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提出了批评。《决定》指出，现在“不少课程内容陈旧，教学方法死板，实践环节不被重视”。要求从小就要培养学生独立生活和思考的能力。当时主管教育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 1985 年 5 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我国陈腐的传统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可以说是一种封闭性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教育内容是固定的，僵化的，教育的任务是灌输这些内容，不能稍加发挥，不能问个为什么，更不能怀疑，考试按固定的内容和格式就行，把学生引导到追求高分数上去。这种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培养出来的人才，只能是唯书、唯上，必然缺乏创造性和进取精神。”万里对中国传统教育（也是文革结束后我们恢复实施的教育）的批评，可以说是一针见血。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决定》明确提出“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根据《决定》的建议， 1986 年 4 月 12 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同年 7 月 1 日起施行。9 月 11 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教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劳动人事部《关于实施义务教育法若干问题的意见》。1993 年 2 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进一步提出 90 年代要在“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在“全国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把“普九”并入“两基”目

标。实施的结果，到 2000 年，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99.7%，初中生入学率达到 88.6%，15 岁以上人口文盲率降低到 8.72% 以下，通过“两基”目标验收的县达到 2541 个，人口覆盖率达到 85%，也就是说，1993 年提出的“两基”目标如期实现。同时，幼儿教育和高中教育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这不仅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大事件，它使我国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从总体上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通观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20 世纪末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虽然成绩是巨大的，不可低估。但发展之不足和政策执行不到位也是值得重视的：第一，教育的主体地位，尤其是基础教育的先导性、基础性和全局性地位还没有被充分认识；第二，教育投入虽然有了明确的政策和法律规定，但在很多年份都没有达到要求，各地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领导认识有高低，导致对教育的投入也不平衡；第三，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的改革，任务更是艰巨，到 90 年代后期仍然有“应试教育扎扎实实”的说法；第四，教育成绩巨大，但必须看到，我们定的标准并不高，只是“基本”实现，人口覆盖率只达到 85%，还有人口占 15% 的地区没有实现“普九”的目标；另外，基础也不牢，由于投入不足等因素的影响，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反弹。

七

就在我国一方面推进教育体制改革，一方面努力实施“两基”目标的同时，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教育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由工业经济时代进入以微电子技术

为代表的信息时代，新的时代需要新的人才，新的人才需要新的教育，其标志事件是 1975 年兴起的“回到基础”运动，这一运动的根本精神是由精英教育回到大众教育。到 80 年代，美国教育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1983 年，美国发表《国家在危险中，迫切需要教育改革》；1984 年发表《赫拉斯折中方案：美国中学的困境》，其中关于“危险”、“困境”之类的呼声反映了美国社会对改革教育的迫切要求；1985 年启动了著名的《美国 2061 计划》；1986 年美国政府又发布了《为 21 世纪培养教师》的行动方案。几乎每年美国政府都有关于教育的重大决策出台，而且都是从国家安全和确保美国在 21 世纪的领先地位的角度考虑的。

就像在经济发展中一样，在教育改革上，紧跟美国的也是日本。就在美国 1983 年和 1984 年的两个报告之后，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于 1985 年发表《关于教育改革的第一次咨询报告》，1986 年、1987 年又连续发表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咨询报告，并于 1987 年，由日本政府批准和发布了《教育改革推进大纲》。在这些文件中，日本直言不讳地承认他们在教育上的危机感，和他们在明治维新时期面对西方列强时体会到的危机感一样。

在欧洲，最快做出反应的是英国；在亚洲，日本之后是韩国；接着，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相继拉开了教育改革的序幕。

这次世界性的教育改革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其基本精神是重视大众教育、人的教育。我国经过改革开放，已经当然地融入了世界潮流，因此这场改革也深刻地影响了我国。我国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就有实施素质教育的呼声，1999 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全国

教育工作会议，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实施素质教育，成为我国汇入世界教育改革潮流的基本方略。2001 年 6 月，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又在北京召开，会前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1 年，国家开始在全国 2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38 个实验区开展基础教育课改革实验， 2002 年和 2003 年又逐步扩大试验范围；2004 年和 2005 年在全国范围推开。与此同时，一些配套措施也相继出台。2004 年，高中课程改革又分别在山东、宁夏、广东、海南等四个省（自治区）拉开了帷幕，这一系列举措，导致基础教育的方方面面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第一章　关于教育目标的变化

第一节　关于教育目标的概念及其他

教育目标是对于人的培养结果和质量规格的规定或要求，它是教育工作的出发点，也是教育工作的归属。第一，它是选择教育制度、制定教育方针的依据。第二，它对教育实践活动起着指导和支配作用。教育目标是教育实践活动的起点，它引导和支配着整个教育过程，人们总是按照一定的教育目标去选择教育内容，采用一定的教育方法，组织一定的教育活动，一切教育过程都是实现教育目标的过程。第三，教育目标使受教育者按照明确的方向发展和达到预定的发展结果。

教育目标中对人的质量规格的规定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人的身心素质发展作出规定，二是对人的发展的社会方向作出规定。前者反映的是个人发展的需要，后者体现的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教育目标通常是由三个不同层次所构成的整体。第一个层次是国家规定的教育总目标，它反映的是社会对教育的总需求，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